

黄树森 主编

叩

别等我 在老地方

转型期新文化景观

杨苗燕 著



广东文艺批评家协会 策划
花城出版社 出版

岭
南

大型书链

别等我在老地

——
转型期文化景观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杨田燕

著

《叩问岭南》大型书链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 05 号

责任编辑:徐建中

徐 华

封面设计:张向春

别等我在老地方

——转型期文化景观

杨 苗 燕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州战士报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125 印张 1 插页 240,000 字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7—5360—2203—4

I. 1894 定价:14.20 元

作者简介

杨苗燕,女,1963年生。历经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等学生生活后,1988年分配到广东省作家协会文艺评论杂志《当代文坛报》任编辑至今。系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广东文艺批评家协会副秘书长。喜舒适悠闲地生活,自由自在地思想。工作之余,读书、聊天、逛街乃平生三大乐事。与工作相联系,断断续续写下理论、评论、访谈、随笔、报告文学等各种文字30多万字。本书是作者的第一本评论结集。



总序

黄树森

中国现代化的进军，是在岭南这一海滩登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代工业文明、信息与知识、经济时代大潮弥漫在岭之南珠江金三角的广袤原野。岭南醍醐灌顶的骤变，激动了海内外一切关注中国命运的人们。岭南十五年的风雨历程，为中国和世界提供了一部形象而具体、切实而生动、深刻而复杂的中国经济文化新形态的“当代史”。

一幅岭南文化新景观，已经拉开序幕，正在上演威古雄壮的戏剧。

叩问岭南，就是叩问中国当下新文化。

1

“提到过去，每个时代都承认它是事实；提到当前，每个时代都否认它的事实。”十多年来，有“南方无文学”之嘲讽，有“南方文化殖民地化”之攻讦，有广东“只有一个半作家”“只有秃子头上的一根毛”（指一篇报告文学获奖）“岭南文化意识还没有觉醒”之议论，还有鬼火也比霓虹灯更富有诗意之怪谈。如此等等，如作警醒诚可传之子孙戒之，若论现状，恐怕是轻薄与陈见齐飞，狭隘共偏执一色了。一副对自己自惭形秽，偏不肯了解研究，只想迎合高攀求宠邀幸的心态。罗素所言的历史悲哀，我们不应再重复了。

2

新时期十五年，中国文坛一派“复苏景观”、“再生景观”，如清晖浩博，汪洋恣肆。时下，又面临着一场大变革，“呼唤”“沮丧”“分化”“重建”的行情日涨，成为新的热门、“爆棚”话题：

一个“精神失望”的年代正在到来，无可奈何地徒唤“精神缺席”、“精神冷感”、“精神虚脱”、“精神阳痿”、“精神乍糊”；

一种要求适应时代发展和需要，承担起历史赋予的使命的新精神——“朝阳文化”，经历萌芽、初苞，逐步进入繁荣；

不习惯、失望和恐惧于现代都市文明，把玩一种“游戏人生”、“调侃人生”；

热切期待构建和拥抱现代都市文明，倡导一种“奋进人生”、“拼搏人生”；

从精神、使命、规范、责任中实行“大逃亡”；

从国家命运、时代趋势、作家责任出发，对精神规则、道德规范实行“大梳理”、“大建构”；

对任何精神规范和终极导引的拒绝，对任何使命和责任的丢

弃、鄙薄，从社会良知和义务中隐去或逸出，纯粹的个人感觉天地，超现实超时空，把文艺绝对作为“个体的心灵世界的呈现”，对读者施行“非礼”、“强暴”；

对重建精神规则、重燃精神圣火、营造新的人文氛围、张扬新历史使命的渴望，对“世纪之交”的文艺走向、超越传统和西方的文学、“第三种声音”、“第三种选择”、“新人文精神”、“经济文化时代”以及“精神深圳/精神废都”、“精神绿化/精神沙漠”的思辨和探索；

还有对艺术价值、崇高、英雄、优美的冷漠、鄙视、挖苦和反讽，以及对生存秩序的自嘲，虔诚朝圣于宗教大观，孜孜探胜于蛮荒小景，津津乐道于个人隐私，顶礼膜拜于欢场粉丛，等等。

3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
农业滞后文明向工业现代文明的演进；
劳力资源经济时代向信息与知识时代的过渡；**

使中国文化的分化、重构和繁荣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和历史必然。

4

在人类文化历史长河中，这些“行情”、“热点”似乎都是“熟悉的陌生人”，只不过是打上中国现阶段的某些国情、民情、文情和时代的烙印罢了。

比如，80年代末，中国文学出现对于荒蛮、原始、神秘、宗教的热切关注，不过是20世纪某些西方文学远离现代都市文明到异国他乡寻找寄托、刺激和眷恋种种选择的一种折射和反照。

比如，这些年，在新兴通俗流行作品给纯文学以强劲的冲击和近乎索命的挑战之后，才掉头重新检视“旧的鸳鸯蝴蝶派”的是非功过；重新评估“旧的鸳鸯蝴蝶派”与40年代海派新文化的“合流”事实；重新看待鲁迅在30年代不仅批评过“海派小丑”，还戏谑过高高在上的“京派大师”，一面批判“旧鸳鸯蝴蝶派”，一面把张恨水

的《金粉世家》作为礼品送给他母亲的事实。

又比如，日本的纯文学通俗文学各各具有相当的亲和力，早就在走一条纯文学取通俗文学的市场眼光和读者需要，通俗文学取纯文学的某些社会内涵和品位档次雅俗共融的“第三种道路”，而不是拼命离间它们，把“纯”的抛出地球，把“俗”的打入垃圾。

再比如，美国新近最畅销言情小说《廊桥遗梦》，无论就其道德涵量、文学品位、审美指向，都比我们一些众人皆“醉”我独醒，只为下一代写作的“先锋”姿态，要和蔼得多，亲切得多，有责任感得多；与那些正在个人“隐私王国”里摸爬，在“欢场粉丛”中滚打的“新言情”小说不可同日语。如果说，张恨水在中国 20 世纪 50、60 年代文坛离“林莽梢杀，落红无数”已相去不远，那么，他还写过中国第一部抗日小说《大江东去》，他的代表作在他的时代还有“当代红楼梦”的美誉，那么，20 世纪 90 年代那无异“文字上的手淫”式的“新鸳鸯蝴蝶派”，真不知该作如何评估，才算得体。

5

笔者视野狭窄，就接触到的，在上述“行情”和“热点”中，似乎牵扯到以下理论问题，信手罗列于次。

就地理形态和生态空间而言。有“海洋和河流使人接近，反之，山岳使人分离”之说（黑格尔），而这种封闭因素对文化对文化艺术在内的精神文明起着种种制约作用，极不利发展商品经济。也有另一说，即西方的农业文明，也是内陆文化，分两线向北、向西传播，而走中欧一线的特别发达，可称之为西方“黄土文化”，否定了黑格尔之说。

就地缘政治经济而言。近一百年来，中国经济文化首先趋于现代化的地区，正是中国东部和南部那些与西方文明频繁交通往来的滨海地区（如香港、广州、上海）；凡交通、商品经济不发达地区，也就缺少现代文明和现代社会意识，这几乎是一个历史规律。但也

有人说，美拉尼西尔居民是最古老的航海民族，而当大地理发现时，他们的发展程度也最低。还有人说，连美国新三K党领袖都承认在“雅利安人还没有脱离野蛮时代而中国已经建立高度文明”，不承认中国传统文化累叠融淀，封闭稳定，会对经济发展造成什么影响。

就社会结构而言。一种意见认为，长城是一个限制文明空间的政治军事环，就算是一个封闭的象征，那又如何解释罗马帝国君主也希望有一长串城墙，来抵御日耳曼族的入侵？另一种意见认为，岳者，垣也，也就是墙，中国古代城市如北京只是中央集权和专制主义堡垒，不同商业和手工业的经济中心，而与纽约、东京、巴黎、伦敦、香港等商厦林立、交通发达的现代金融城市，形成鲜明对照。广州，则是民主主义的发源地，商品经济发达，因而市民阶层在现今10多年成为传统社会向商品社会跃进的动力，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文化的开放和繁荣。

就文化的生存条件和价值而言。一说各类文化都有生存条件和价值故而“文化无优劣论”，或说“文化发展程度无差别论”，还有所谓商品经济越发达越没有文化的“南方无文化论”、“海洋文化正沙漠化论”、“南方不可能产生精英文化论”等。

就文化与环境而言。有“环境越困难，刺激文明生长的积极力量就越强烈”之说，有汤因比的“文明产生于一种既不甚好、也不甚坏的环境，太好则提不出挑战，也引不起应战；过坏，则挑战过于强烈，使人类无法应战，或完全被环境压跨”之说。

就文化与经济而言。一是认为经济繁荣，则文化衰败；二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被看作是“弘扬”传统文化的典范，原因是他们“发了”，认为对传统文化的“利弊”要看得复杂一些，不可以一时可用否定优劣。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文化是反经济、反生产的，因而中国的问题，根源于文化的多，根源于政治的少，而世界总趋

势是，好的经济就是好的政治（梁厚甫）。

就南北文化的气质而言。西方的南北论始于丹纳，其后又有汤因比。中国的南北论，始于孔子。春秋时期，孔子谈及南北差异，“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口衬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君之”；又说“北者杀伐之地，南者生育之乡”。战国时晏子使楚，曾拿南方之桔北上变枳为喻，说得楚王哑口无言。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论述文化由北向南的演变历程：“三代之上，淑气聚于北，而天气移于南。郡县封建易于人，而南北移于天，天人合符之几也。天气南徙，而匈奴给强，渐与幽、并、冀、雍之地气相得。故三代以上，华夷之分在燕山，三代以后在大河。”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称：“江南士大夫多失之于轻薄奢淫，这是梁陈诸帝‘遗风’。河北之人，大致失之于斗狠劫杀，这是安史之乱的‘余化’。”还有王国维氏北方诗歌得之于感情、南方诗歌得之于想象之说，强调北方文化心理结构与南方自然景观激起的融汇结合。有鲁迅氏内陆文化“颇乏天惠，故重实际而黜玄想”之说。还有所谓：北凝重、朴质、沉稳，南灵动、飘逸、透明；北权本位，南钱本位；北抑商，南尊商；北崇尚过去，南向往未来；北眷恋黄土地，忧患意识较强，南放眼大海洋，乐观精神较多；北重思考，不时流于空泛，南重实利，间感厚度不够；北对外来文化，虽易于惊异并沉溺其中，但得益匪浅，南虽觉不甚新奇，取漠然态度，似获益无多；以及南出不了《红高粱》，北出不了《商界》等，不一而足。

6

南北、东西，本土、异域，一面存在文化差异和冲突，一面又在交流中融汇贯通着，自古皆然，用不着大惊小怪，顺便摘引一些有趣的事。

二次大战期间，美国官兵在英国集结，英国人与美国人发生了摩擦。美国人总觉得英国人太爱表现自己，什么话都要先说出来，

夸夸其谈，自我吹嘘。英国人觉得美国人高傲、“牙擦”。

日本人与美国人谈生意时，日本人看美国人的信，会因为一开头就把条件摆出来，感到不舒服，以为美国人以势压人；美国人看日本人的信，则觉越看越糊涂，通篇客气话，不得要领。照日本的习惯，最重要的事应在最后谈，而美国人的习惯正相反。因此之故，美国人看日本人的信，为了自己心情舒畅，最好从末尾读起。

1988年，某报有篇谈中国人与美国之比较的文章，说：中国人在街上争吵，在人代会上比较心平气和；美国人在街上客客气气，在国会上却争吵不休；中国人爱夸祖国，美国人爱夸自己；中国的报上成就多，是乐观主义者，美国报上灾难多，是悲观主义者等等。

日本几家大企业规定行政管理人员要读中国的三部古典书《孙子兵法》《三国演义》《西游记》，主张生意之道，理论上要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实践上要经验总结，以及商战需要海阔天空式的幻想和创造。在日本各地出售睡眠辅助工具的眼罩、耳塞、催眠画时都要赶制与中国人孟浩然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关的包装，挂上孟浩然的画像，日本的教授还从医学角度，论证“春眠一刻值千金”。科学地发挥诗歌观人情、征人心的功效。即使东方文化本身，中日也存在差异。

这些理论阐释和趣事闲笔，有助于拓展我们的视野，有助于我们的研究、分析、比较，向纵深递进开掘。**但在实际的历史和理论的历史之间是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的。**

7

当代理论学术的发展正在拆除各种世代横亘隔阻往来的城垣，跳出传统的批评标尺、价值取向、审美习惯的藩篱，不受封闭僵化气氛、社会心理的左右，去测度、权衡某一种文化形态和文艺。深刻、有益好看、亲切感、创造性、文化意味、哲学思考、文学史意义都可以作为一种标尺，符合多种标尺，可

堪称佳作。席慕蓉的诗很叫座，很有灵气，但不是十分深刻，波特莱尔的《恶之花》很深刻，但美感不强烈。

文艺批评标准不是抽象而是具体和发展的，在不同的历史和文艺阶段都有不同的历史内涵，也有着其历史局限。但每个时代每个国度都存有一种不可或缺、着力张扬、推动历史和社会发展的主流文化。如美国影片中色彩十分强烈的“美国精神”“美国英雄”，香港影视中的“香港精神”“香港英雄”。

当代中国，由于多种的经济成分，相异的利益关系，不同的人生追求，使得社会价值目标的选择多元化。但其评判标准，则应是利于维护国家、集体与个人正当利益实现和兼顾体现社会公正、人际关系和谐和个人自由天地的广阔施展，促进生产力发展以及遵循与其相适应的新精神规则、道德规范。符合，则是善的、道德的、美的、公正的，反之，则是恶的、非道德的、丑的、不公正的。

规范相同或接近，就能沟通，能对话，能共振。

未庄的尺子量城里的一切，城里的作品一部也上不了席面。

血压计不准，12 亿人都可能患高血压。

8

从实际的历史考察，处于社会、经济、时代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今文化（即开放改革 15 年的新时期）存在的三种态势：

以生态空间、地缘经济计：

一是以广东、上海为龙头的东南沿海小片的前工业社会；

一是以内陆为依托的大片的后农业社会；

一是西北西南残存的游牧社会。

新生的工业文明被强大的农业文明包围着，但充满活力、合乎潮流的现代工业文明刺激着、变革着、取代着僵化、滞后的农耕文明，由沿海向腹地推移辐射开去，形成反包围。

以文化形态计：

取法 20 世纪西方文艺远离现代都市文明到穷乡僻壤、异域他方寻求原始、蛮荒、粗犷、宗教式的“回归传统”。

逃避中国的深厚的人文精神和丰富的文化传统，膜拜“孤独”，消解“崇高”，嘲弄“使命”，清算“优美”，主体自定性与主体盲目性的悖逆，激情泛滥与思想孱弱反差式的“学步西方”。

在双向反省批判的碰撞下，探索文化的互渗融合，无论对传统和西方，都旨在能激活出新的超越，形成一种新张力和引力的“第三种声音”或“第三种选择”文化。

以文化气质和思潮计：

我国文坛历经“反思”、“批判”和走向“审美”、“娱乐”两大阶段之后，出现强烈的否定之否定的渴求，渴求沉思和总结、探索和发展文艺对于推动社会和历史前进的新精神规则和精神支持及人文品格。代表性的论点之一，如著名小说家刘斯奋表述的“朝阳文化、巨人精神和盛世传统”。

无可讳言，社会对文化的需求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各种文化形态可以而且应当在变革中并存共进，各各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新的生长点，由读者筛选，听历史评判，任时代淘汰。尽管，各种理论“时尚”，像时装进击女性，像“原始股”热致人疯狂，但新文明的晨钟注定要取代旧文明的暮鼓！

9

中国当代文化，正在遵循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有一种复归、扬弃、变异和超越固有文化文本的趋向。假如以上中国文化的三种态势可以作为一种度量衡或参照系的话，那么，转型期的岭南大文化或珠江大文化圈，应是一种显示中国市场经济雏形，呈现信息与知识时代先声，初露工业文明征兆的新文化；是一种既超越传统又超越西方，符合“没有专化”而又“易

于完成”“突然的飞跃”的文化进化“潜质法则”，^①倾注着现代意识、世界意识、经济意识复杂交织的“第三种选择”文化；也是一种呼唤进取、昂扬、包容，与时共进、与世俱新的文化。

10

哈佛大学出版社在介绍美国教授傅高义《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一书时，称广东为“社会主义第一小龙”，这出自傅的结论：“如果说广东的改革在中国先行一步，那么对于社会主义世界其他国家而言，也许就是先行两步了。”与阿诺德·汤因比的“在今天，远东社会的最突出代表无疑是日本人和广东人”，似有某些相近之处。两个外国人的断语，未必字字珠玑，却也道出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的某些异质性，道出了中国内陆文化和中国海洋文化两大板块的某种差异和比照。对此，无需像清朝一位大学士连欧洲存在西班牙葡萄牙都不承认，认为那是外国人说的。这类议论，在费正清的《中国与美国》、梁厚甫的《谈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面》，亦多有旁及和论述。

文化的定义据说有 260 种，比较权威的如《苏联大百科全书》、德国《迈尔百科全书》、《大英百科全书》、《法国大百科全书》。为了便于说明，笔者取迈尔的提法，即“人类社会在征服自然和自我发展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即一种“大文化”的概念。

笔者曾在一家刊物主持就开放改革以来出现的“经济发展了，文化会不会萎缩”的“岭南之谜”和“珠江大文化现象”进行过长达 8 年的讨论，提出“珠江大文化圈”一说。自忖这不光是一个历史问题，而且是个现实问题，不仅国人关心，又为外人注目；不单是个复杂的学术理论问题，且为当今文化或文艺实际发展之急需。

^①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塞维斯曾总结出文化进化的潜质法则：“那些不同的，相对没有专化的文化，则适合于完成突然的飞跃”，“后来者居上”。引自秦朔《大脑风暴》一书。

个中因由，那是因为岭南经济文化正面临着大腾飞的客观事实与严峻的历史选择。

科技大迁徙的挑战。日本科学史家汤浅指出：近现代科学中心，大迁徙的平均周期为 80 年，其顺序次第为：意——英——法——德——美（1920 年至今）。而未来科学中心，出现周期更短的涨落，将在美日环太平洋展开激烈争夺。岭南资讯发达，市场发育较好，又作为开放最早的太平洋地区，这种科学大迁徙更具挑战性和可遇不可求的历史机遇。

移民大迁移的冲击。岭南经历历史上第四次大移民潮，如同当年鞑靼人和马来人南迁一样，外来人于逆境中的拼搏，于生存中的奋起，于南北差异中激发的能量，极大优化了人的组合和人的素质。这种大迁移，带来了强劲的劳力、科技流向：“十万才子聚广东”，“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百万民工下珠江”。

人文大环境的祥和。你侃你的，我做我的。你发你的牢骚，我抓我的实惠。你靠嘴皮子图解脱，我拿拼搏赌明天。你眷恋原始，我喜欢新潮。你穷于理，我求于变通。你为下海上岸争论不休，我既不下海也不在岸上两头兼顾。你以深沉饮誉，我以开创见长。岭南生长着一种崭新的文化心态和文化精神，风行一种亲和融通、奋力自强、积累实惠的人生哲学，为中华文化的未来发展提供一种可贵的启示和灵感。

经济大递进的涌流。岭南首府广州是千年不衰的国际通商港口城市，解放后，广州成为南北经济交往的大枢纽，又是内外经济交流的大舞台。1957 年以来，全国的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商品在“广交会”成交出口。广州经济实力列全国十大城市的第三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列全国十大都市的第二位，居民家庭平均收入位列全国十大城市的第一位。

“广州具有特殊的区位优势：地处穗、港、澳小‘金三角’，北接

华南经济圈，南通海外市场。

“地处粤、港、台中‘金三角’，内联中国大陆，外跨国际市场。

“地处中、日、美大‘金三角’，又是亚太经济高增长的热点地区。”^①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日益逼近，“一国”对岭南是一个机遇，“两制”对岭南也是一个机遇，极有利于岭南经济圈与环太平洋地区和国际经济的对接和交流，香港则是实现这一对接和交流的纽带。中国大陆的文化资源和母体一旦与香港现代化工业生产方式结合互补就可以产生难以估料、不可遏止的文化能量。

文化经济大亲和的激发。在岭南，头脑资本正在创造，融和着货币资本，知识生产力科技生产力正在成为发展的关键因素。借用《大脑风暴》(秦朔)一书的归纳，它包含着“企业文化演进，经济结构的知识转型，大众消费中文化含量的增加，市场营销的文化策略，不同人文资源之间的互动结合，经济社会新的道德观、事业观、价值观等方面的内容”。换句话说，即人民的生活方式、经济行为、城乡关系、人际交流、价值体系发生骤变之后，经济和文化大亲和之后，所激发的新文化相变、思考和建构。

11

笔者1989年1月在为“珠江大文化圈”的讨论写的一则“手记”有言：

“窃以为，‘珠江大文化圈’，是中华内陆和外来文化的接合部和临界点，与内陆文化元素密集、有序、稳定比照，更具有兼容性、可塑性，更易产生新的文化相变。它在近代漫长的历史川流中涌现了改良派革命党的领袖康、梁、孙中山，后面贴近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底核，前面沐浴西方文化急涛骇浪的拍激冲汇，更易激

① 王琢：《广东三点开放战略》，香港《文汇报》1995年3月。

起新思想文化的裂变；它在近 20 年，珠江三角洲一“角”的香港跃入亚洲“四小龙”行列，商品经济大潮漫在珠江三角洲广袤原野，人的价值、行为、性格滋生了新的变异，碰溅前所未有的现代文化火花，增添新异文化神趣和气韵。深圳民俗文化的张扬；广州现代都市文化的兴起；香港影视文化之流波所及，广东影视文化之渐新，南风北渐，对内陆文化的辐射挑战；中国第一部写商人长篇小说《商界》的面世；广州语言文字习俗由于北方移民和港台影响融汇南风北俗所带来的若干新质，这都预示着珠江文化的形态的复苏、成熟和发展。倘若不是以西方文化模式为标测度，不是以腹地文化定于一尊，你只能老实地探索、实证，不能弃绝它；骂，于事无补，像《老井》一样，骂完了还是没水喝。

“珠江大文化圈，不必沉溺昔日的荣华，也不必哀叹今日的偏见；不必庸俗地歌功颂德，也不必雅致地妄自菲薄。”

12

回首 8 年来的风雨历程，出现了许许多多饶有兴味且令人咀嚼的文化现象。

周昌义的预测。1987 年当笔者所主持的刊物发起文学上的“岭南之谜”讨论时，北京著名作用周昌义预测：文学上的“岭南之谜”，将无一例外地在若干年后，引发出一个文学上的“北京之谜”或别的什么“谜”。如今，事实应验了周君的预见。中国新文化的曙光，往往要通过困惑、浮躁、彷徨、痛苦乃至残酷的隧道才可获得。广东比较早陷入转型期所带来的困境，也比较早得以解脱，开始进入良性的人文生态环境。这主要只是个时间差问题。

《商界》的遭遇。1988 年广州作家欧伟雄、钱石昌创作了第一部正面而又出色反映中国商品经济的长篇小说《商界》（北京《当代》杂志连载），广东《当代文坛报》、北京《当代》、上海《文学报》和《广州日报》文艺部联合召开讨论会。这“第一部”，终未引起腹地文